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德凝视

马 丽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广东 珠海 519085)

[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寄寓于人们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 蕴含着深远且丰厚的道德精神, 是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构成, 是独具特色的地方性道德知识, 维系着族群道德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 是道德传播的重要载体。非物质遗产道德功能的开发必须合乎道德, 在保护与利用中坚持功利性与人本性的统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和谐、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道德凝视; 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 G 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0) 02-0049-07

“凝视”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文论和文化批评中一个重要的概念, 但其原始的基本含义是指专注地看, 与“凝视”理论强力推崇的权力运作、欲望纠结及身份意识无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德凝视”所表达的一个基本学术设想是, 不仅要拓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道德视野, 而且要深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德表达, 开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德内容。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德属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它可以是一种动态的表演或技术, 也可以是一种静态的实物或场所; 它可以是一种社会风俗的记忆, 也可以是一种审美情趣的表达。但隐匿在各种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差异性之后的共同属性, 普遍是各族群道德精神的物化和具化, 普遍反映了各族群规范身与心、人与我、群与我以及天与人之间的理论智慧与实践经验。

人们一般认为, 道德与伦理是一个概念。从词源学上看, 在西方的确如此。因为“‘伦理’源于古希腊语‘ethos’, 意为品行与气禀以及风俗与习惯。‘道德’源于拉丁文‘mos’, 意为品

性与风俗。所以, 道德与伦理在西方的词源含义相同, 都是指外在的风俗、习惯以及内在的品性、品德。”^[1]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对此有过专门的论述: “伦理德性则是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 因此把习惯(ethos)一词的拼写方法略加改动, 就有了伦理(ethike)这个名称。”^[2]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创造的出来的, 其本身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 因此就必然具有群众性的特质。这主要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主体不是为数极少的精英阶层, 而是广大的乡土群众。同时,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地自然环境、社会生活环境密切联系, 都深深地烙上了地方的特色。^[3]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婚丧嫁娶、传统节庆等民俗活动, 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活性和群众性的重要例证。它们采取一定的形式, 表达了一定的伦理观念, 形成了一定的风俗习惯。因此, 隶属于道德实践的范畴并期待着道德理论的凝视,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属性。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通常是指在人们生活中形成和世代相传的思想、道德、习俗等文化内容和形式。不论任何东西, 它要代表传统, 就一定具备以下两个特征: (1) 它是在过去或历史上产生或形成的、经历了一定的延续和积累过程的东

[收稿日期] 2019-04-26

[基金项目] 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 (18JDSZK045)

[作者简介] 马 丽 (1982—), 女, 广东韶关人, 副教授, 硕导, 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

西;(2)对于人们现实的生活说来,它是流传至今,或仍存在于现今的东西。也就是说,传统是指走到“现在”的“过去”,是“过去”在“现今”的存在和显现,而不是单指过去曾有的东西。^[4]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对传统概念的理解主要包括三个要点:其一,传统是人们代代相传的事物;其二,相传的事物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其三,传统具有持续性。^{[5]15-21}在解释传统的“持续性”时,希尔斯论述说:“一种范型要被延传和继承多长时间,才能作为一个持续的实体被看作是传统呢?如果一种信仰在形成之后立刻被摒弃,如果其创始人或倡导者提出或身体力行这种信仰,但却没有人接受它,那么它就显然不是传统,如果一种信仰或惯例‘流行’了起来,然而仅存活了很短的时间,那么,它也不能成为传统,虽然在其核心部分包含了作为传统本质的延传范型,即从倡导者到接收者这样的过程。它至少要持续三代人——无论长短——才能成为传统。”^{[5]19-20}道德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累积而成的习惯和风俗。因此,生产生活不同,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就必然存在差异。不同族群初创、发展和继承的相互差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本上反映了不同族群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不同族群的先民立足于其特有的生产生活经验,发展和维系了其特有的道德观念。这种道德观念内化于人们的思想中,外化为客观世界的实物之上。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道德外化的重要载体,成为“人类伟大文明的结晶和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是人类文化整体内涵与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蕴涵着该民族传统文化的最深根源,保留着形成该民族文化身份的原生状态,以及该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审美观念等”^[6];“是国家、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和宝库,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历史、民族个性、民族气质、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有机组成和重要表征”^[7]。

2. 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了特定族群的生活伦理。在人类文化的诸多传统中,有“大传统”也有“小传统”。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认为:“在一个文明中,存在着一个具有思

考性的少数人的大传统和一般而言不属思考型的多数人的小传统。大传统存在于学校或教堂的有教养的人中,而小传统是处于其外的,存在于不用书写文字的乡村社区生活中。哲学家、神学家、文学家的传统是一个在意识上的培养的传统,并输送下去。而最大部分人民所属的小传统被认为是被赋予的,不用仔细推敲的或被认为要提炼和润色的文化。”^[8]这种小传统的实质就是人们的生活伦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共同体期望的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代代相传中传递的是共同体的价值观,反映的是特定族群的生活伦理,在具体的民间生活中产生并成长,凝练着大众质朴的生活风俗与生活态度,浸染着乡间里道最真实的生存智慧与生存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其本身就是人们生产生活的一部分。比如一些饮食的制作技艺和服装服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婚丧嫁娶等习俗,本身就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各种风俗习惯”^[9]。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特定族群的道德认同,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20世纪2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就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认为一个社会中有多少个群体和机构,就有多少种集体记忆,这些记忆是其各自成员历经很长时间才得以建构起来的,它是维系群体与机构延续与发展的灵魂与基础。^[10]而族群道德认同便正是基于这些“集体记忆”和“共同记忆”之上的,族群个体对族群共同体的感情依附与归属认知。^[11]现代社会“任何族群离开文化都不能存在,族群认同总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要素表现出来,族群认同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因此,这些文化要素基本上等同于族群构成过程中的客观要素”^[12]。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扎根在民间和族群个体的心灵深处,是特定族群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所长期积淀形成的生活方式、情感特征、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凝聚着族群智慧和感情,是凝聚族群的灵魂。“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她独有的民族精神全民性的活的记忆，是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维系民族存在的生命线。”^[13]

4.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道德教育的重要素材。道德教育是指依据一定的道德准则和要求，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对人们进行有组织有目的的施加系统道德价值影响的道德活动。道德教育是道德活动的重要形式和人类教育的重要方面，是培养道德品质、提升道德境界、调节社会行为、营造社会舆论、改善社会风气、维护和促进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道德教育具有不同的方式，例如叙事的方式、情境体验的方式和榜样示范的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人的初步印象是，要么与观赏有关，要么与饮食有关，但是，往往忽视了，它们更与美好的道德追求有关。比如，各个名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为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传承下去而面对的斗争、挑战或者挣扎，本身就是一个个鲜活的道德教育故事。观众在观赏或者品尝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如果能够深入其内核，了解到它背后的心酸与艰辛，那么，这就不仅有了感观上的享受，更有了精神上的洗礼。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具有强烈的个性化的“个人知识”，其核心内涵是“非物质”的，是艺术家在表演和制作过程中含有的特殊内蕴和技艺，更可能包含着一种精神追求和道德境界。珠海沙田民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历史与现实、根脉与生活、内涵与表象于一体”^[14]特殊价值和优势，传播新时代道德观念与社会核心价值。党的十七大召开，歌队结合会议精神，编写了《十七大精神放光芒》等曲目，将党的方针政策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开去。汶川大地震，歌队连夜创作了《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爱心善举感动天》等歌曲，及时向群众传达了地震灾情，激起众人为灾区捐款。沙田民歌在歌曲内容上已常作常新。像《风流人物数南屏》《八荣八耻记心中》《代代相亲共融和》等都是紧扣时代主题，反映当前百姓群众最关心的话题。通过参加香港、澳门民间艺术大巡游，参加国内的非遗文化交流，参加世博会“广东周”节目展演，短短几年间，三灶鹤舞逐步从三灶走向世界。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德开发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一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与精神的传承，是民族或地区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记录着民族或地区生息繁衍的历史，凝结着民族或地区的道德精神。非物质文化从其诞生之初传承至今的历程，同时是其道德内涵在流传中不断被赋予、被想象和被重读的过程。在这千百年的历史演进中，受历史条件、经济形态、生产生活方式及群众思想观念的局限，珠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德内涵中，可能既有金砾玉石，亦有残渣败絮；既是精神动力，亦是沉重的包袱。我们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

1. 人本性原则。人文、人本或人道，具体表述不同，但实质和精髓都是指向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肯定和尊重，从而本质地区别于物本、神本、君本和民本。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主要是指，对人的生存状况、意义、目的和价值的关注，对人的解放、自由和发展的追求，对人的尊严和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15]人本性原则落实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道德价值开发中的要求就是，“不能只是静态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单纯性的保护、保存，必须关注保持这种文化的人们的幸福，以明确的意图更为积极地加以有效利用和应用。我们有必要对以往的保护、保存、有效利用的机制进行较大的改变。当然，这些有效利用和应用，始终只有在有助于人类幸福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肯定。”^[16]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很多存在经济因素而具有经济价值的代表性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对这些项目进行合理开发，可以在当今市场经济背景下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融入现代经济社会，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活力，使传承人和相关群体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促进当地经济和文化发展。

2. 针对性原则。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内容和多种价值要具有针对性。不同的群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德价值有不同的接受能力。“接受”，是关于思想文化客体及其体认者相互关系的范畴，教育的主客体关系正是其中要义。

道德把握世界方式的特质决定了道德教育是人类价值认识的成果,因此只有关注价值主体人的需要、动机、情感,寻找主客体间最大的可接受性契合点,道德规范才能内化,道德教育才能落实。道德教育的可接受性原则强调的是道德教育要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同主体的道德需要相契合。道德不是被动地反映世界,而是从人的需要出发,从特定的价值出发来积极改造世界的;道德的目的不是再现世界,而是对世界进行价值评价和价值取舍。^[17]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道德价值挖掘脱离了受众的接受性,那么,其道德价值在教育层面上就是无效的。以青年学生为例,如果教育者不理解学生思想特点中既成的事实,而是根据对学生思想特点的主观判断,那么,教育就容易成为隔靴搔痒或者自说自话似的一厢情愿。这些青年学生既成的思想特点与教育者希望传导的价值观念或者相吻合或者相背离。如果相吻合,那么,教育就无须重复和赘述,以免造成教育的过度;如果相背离,那么,教育就必须着力攻克和解决,以免造成教育的不及。无论是过度或者不及,都是教育无效性的表现。因此,理解不同受众的思想特点,有选择性地选用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针对性地挖掘其道德价值,坚持联系实际,区分层次和对象,加强分类指导,找准与人们思想的共鸣点,契合与群众利益的交汇点,做到贴近性、对象化、接地气,十分重要。

3. 时代性原则。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技术要体现时代性。当今社会,数字信息科技和世界经济贸易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形态变化的重要因素。数字信息技术在逐渐改变着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的同时,也在主导着世界经济贸易的运行形式。在这种社会形态下,“言传身教、口传心授”的传统方式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充分运用数字信息技术,便可以有更广泛的存在形式,从而实现传播、传授和传承,甚至生成富有经济价值的产品。西方发达国家,透过先进的数字信息技术,在影视、信息、游戏等文化产品制作、生产、传播、销售和服务上占有较强的优势,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利用率也明显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18]二是非物质的内容要反映时代性。比如珠海沙田民歌艺术在20世纪六七

十年代一度失传过,尤其是在流行歌曲、卡拉OK的冲击下,以反映疍家人打鱼围垦生活和水上人家风情为主要内容的沙田民歌在传唱了几百年之后,几乎没有人再提起。即使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其受众范围仍然十分有限,不及青年人对影视和网络的热爱。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但不是“死”的而是“活”的传统,它必须与时代同步,融入时代,反映时代,否则,就只能沦为极少数人自娱自乐的观赏物。比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涵养作用,有利于落实、落小和落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和教育更接地气。因此,不少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努力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利器。

4. 地域性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的知识很多时候是一种与普遍性知识相对的地方性知识。它“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而且‘地方性’(local)或者说‘局域性’也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它还涉及到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context),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地方性知识’的意思是,正是由于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的,因此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情境条件”^[19]。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开发就必须遵循地方性知识的特性,重视地域性。比如,飘色是一种融戏剧、魔术、杂技、音乐、舞蹈于一体的古老民间艺术。“飘”指脱离地面,尽展凌空之美;“色”是精巧巧妙的伪装。飘色作为一种流动舞台上的戏剧造型艺术,每一台飘色代表一个故事内容。现在,广东不少地方都有飘色。例如,南雄的飘色,更多地融入了当地的历史文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飘色有什么特色?飘色所演绎的故事传达了什么样的特别的道德价值?这就是值得努力挖掘的特色,而且这更具有独特的教育意义。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德开发路径

1. 纳入国民教育。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在其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当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价值，一方面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除了包含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大量的科学知识，还有许多极富审美价值的文化艺术精品，值得用这些重要的、科学的、美丽的知识和内容去进行个体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另一方面是说，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成为教育的一个重要领域，使教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一条重要途径。这就需要主动设置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在各级各类学校讲授，使广大学生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其重要性和价值，培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传承、研究、管理、开发的专门人才；在社会上进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和重要性的宣传教育，形成重视、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风气，从而通过教育教学的作用更好地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有效地保护和传承。”^[20]迄今为止，法国大学所开设的四个非遗专业，无论是本科还是硕士阶段，皆为职业定位的国家文凭，包括：尼斯大学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专业学士学位（L3）；图尔大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硕士文凭（M2）；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博物馆学：非物质遗产与收藏”专业硕士文凭（M2）；蒙彼利埃第三大学与图卢兹第二大学联合推出的“非物质遗产的民族学鉴定”专业硕士文凭（M2）。^[21]法国大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除了以学位专业的形式出现外，还以独立课程的形式被纳入到历史、艺术、文化遗产类的传统学科教学中。一些院校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述实际上是对文化遗产认知的补充和延伸，因而倾向在现有的学科基础上，采取增添非遗课程的做法，及时梳理学科发展脉络，进一步完善原有的知识体系。目前，法国有两所大学——波城大学和雷恩第二大学使用独立课程的方式进行非遗教学。^[21]当前，珠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部分地进入少数国民教育课堂，比如，斗门区乾务中

心小学以第二课堂的形式把乾务飘色引进学校；金湾区在小学广泛开展的鹤舞鹤歌培训；香洲区在南屏广生小学开展的沙田民歌教学、吟唱；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斗门佛家拳也走进了斗门五山中心小学的课堂；金湾区编制图文并茂展示鹤衣制作和舞蹈技艺的本土教材《三灶鹤舞》；海澄小学和海华小学开设了鹤舞班，村里成立了鹤舞队，由三灶鹤舞传承人陈福炎亲自传授技艺。“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机制，把具有道德教育作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进教材、进校园，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青少年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使广大青少年了解相关知识，在品味艺术作品甚至是在了解艺术的制作中来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涵的道德力量，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提升道德素养。”^[14]

2. 融入日常生活。从各地的实践来看，有的地方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民俗活动。依托“我们的节日”活动等有效载体，利用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节等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组织开展一系列活动，扩大传统节日的影响，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通过一系列节日活动，大力宣传 and 弘扬以互助、诚信、敬业、孝敬为重点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主动宣传善、大力倡导善、积极唱响善。^[14]有的地方经常性举办展演等活动。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区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演出活动，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机关、进社区、进乡村，并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大众传媒，进行广泛宣传，培养民族文化自觉，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在这些活动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支持相关社区、乡村举办民俗活动，充分发挥民俗的道德提升、教化和约束作用，对人民群众进行道德教育、行为规范和人格塑造。^[1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河北省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创作反映时代精神、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给人以思想启迪与精神动力的艺术作品。如利用河北梆子、唐山皮影、沧州落子等民间戏曲形式进行创作，以艺术的形式宣传在“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

动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的感人事迹。^[14]

3. 进行数字化保护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实际上就是运用数字采集、数字储存、数字处理、数字展示、数字传播等技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换、再现、复原成可共享、可再生的数字形态,并以新的视角加以解读,以新的方式加以保存,以新的需求加以利用。^[22]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基本停留在拍照、采访、记录、物品收藏等简单层面,这些传统的保护手段,确曾保存了大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有其局限性,如录像带的老化、录像色彩的蜕变、录音带的失真、文字资料的保存不善等,再加上拍摄角度的限制,也影响了其长期保存和利用。而数字化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许多全新的采集记录手段,包括图文扫描、立体扫描、全息拍摄、数字摄影、运动捕捉等。同时,数字化存储技术也提供了许多新的保护手段,包括通过数据库、磁盘阵列、光盘塔、光纤和网络连接以及相关规定、协议,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有效保护。另外,有效利用数字化展示与传播技术也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广泛共享提供了平台。虚拟展示集虚拟现实、图文声像等多媒体表现手段于一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计算机虚拟世界中展示,以平面、全景显示或立体空间成像的方式,将声、光、电产生的效果以一种直观方式全方位、多视角向大众展示,与传统的多媒体展示相比,可视性、趣味性都得以增强,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有效传播。如唐家湾的鸡山牛歌、斗门的乾务飘色等,都可以通过数字化展示与传播技术使之更广泛且有效地在社会中传播。

4. 保护与发展并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人们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产生和发展的,因而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时,就不能将它从其所形成和发展的环境中抽离出来。现在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农业文化以家族、村落、社区为基础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受传统的制约,而今天社会文化已发生巨大变迁。在珠海,不少原有的村落村民早已成居民,脱离了原来的农业生活方式,如果为保护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

让他们保持或退回到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或者说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让他们固守贫穷,是不现实的。而在保护与发展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而,在花财力物力人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还应该关注到该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存的这个群体,并给予必要的物质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跃起来。”^[23]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特定族群道德精神、道德情感、道德情感和道德知识的有机组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教育价值。根据社会发展和教育需要,因时、顺势、因事和因人的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德教育内涵,是“以文化人”的重要命题。

[参考文献]

- [1] 王海明. 伦理学原理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75.
- [2]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科伦理学 [M]. 苗力田, 译注.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25.
- [3] 李占伟.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道德价值探究 [J]. 民俗研究, 2013 (5): 22-28.
- [4] 李德顺, 孙伟平, 孙美唐. 家园——文化建设论纲 [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 [5] 希尔斯. 论传统 [M]. 傅铿, 吕乐, 译注.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 [6] 王文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论文集 [C].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3.
- [7] 向云驹. 从自在走向自觉——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的作用与地位 [J]. 文化学刊, 2008 (2): 24-29.
- [8] REDFIELD ROBERT.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70.
- [9] 宋俊华. 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刍议 [J]. 江西社会科学, 2006 (1): 33-37.
- [10] 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 [M]. 毕然, 译注.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40.
- [11] 王希恩. 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 [J]. 民族研究, 1995 (6): 17-21, 92.

- [12] 周大鸣. 中国的族群与族群关系 [M].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2: 9.
- [13] 贺学君.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思考 [J]. 江西社会科学, 2005 (2): 103 - 109.
- [14]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组. 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N]. 河北日报, 2012 - 08 - 22 (007).
- [15] 李萍, 童建军.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返本归真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 (5): 139 - 146.
- [16] 管丰, 陈志勤. 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J]. 文化遗产, 2009 (2): 106 - 110, 158.
- [17] 罗国杰. 伦理学百科全书·伦理学原理卷 [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 109.
- [18] 姜芸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再造 [J]. 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16 (1): 12 - 17.
- [19] 盛晓明. 地方性知识的构造 [J]. 哲学研究, 2000 (12): 36 - 44, 76 - 77.
- [20] 王文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 [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118.
- [21] 杜莉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高等教育的新使命——以法国大学为例 [J]. 现代大学教育, 2016 (3): 45 - 51.
- [22] 王耀希. 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8.
- [2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161.

A Moral Gaze a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A Li

(Zhuhai Campu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uhai 519085, China)

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ying people’s special way of production and life, containing far-reaching and rich moralities,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raditional moral culture, a unique local moral knowledge, and maintains moral identity of ethnic group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of moral education and a significant carrier of moral dissemin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ral function of intangible heritage, in the course of its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must conform to morality, and stick to the unity of practicality and humanity, the harmony of history and time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particularity and universality.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oral gaze; moral education

(责任编辑 杨中启)